

丽泽人文
学术书系

小说类型与“当代叙事”

Fiction Genres and
“Contemporary Narrative”

徐 勇◎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丽泽人文学术书系

浙江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一流学科建设成果

浙江省社科规划“之江青年行动计划”、“之江青年课题”研究成果

小说类型与“当代叙事”

徐 勇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说类型与“当代叙事” / 徐勇著.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丽泽人文学术书系）

ISBN 978 - 7 - 100 - 14984 - 6

I. ①小…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80208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丽泽人文学术书系

小说类型与“当代叙事”

徐勇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4984 - 6

2017年6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张 17 1/4

定价：56.00元

谨以此书献给九泉之下的老母亲

目 录

导 言 “当世叙事”与“现世主义”写作.....	1
第一章 改革题材类.....	4
第一节 改革小说的现实与“现实性”.....	4
第二节 《乔厂长上任记》与改革文学.....	9
第三节 时间和数字的神话能走多远.....	11
第四节 两种改革及其合法性问题.....	16
第二章 农村题材类.....	22
第一节 想象农村的现实及其多种可能.....	22
第二节 乡土社会现代转型中的缩影及宿命.....	27
第三节 城乡二元对立的全球化想象及其悖论.....	35
第四节 全球化进程中的乡土寓言写作.....	40

第三章 城市题材类.....	52
第一节 想象都市的形象与镜像	52
第二节 千年古都与文学想象的最后辉煌.....	57
第三节 以象征的方式重新介入现实.....	62
第四节 远离“文化塑城”的几种可能.....	75
第四章 反腐题材类.....	85
第一节 “互文”现实的深度与限度.....	85
第二节 依法治国的矛盾及其可能	90
第三节 “剩余”时代的文学写作与残缺.....	94
第四节 反腐困局与人性幽暗	104
第五章 社会风俗与综合反思类	113
第一节 时代与社会的倒影、逆光及其前景	113
第二节 当代启示录与备忘录	117
第三节 社会分析与现实表征	126
第四节 历史反思之后的个人主义与颓废写作	130
第六章 市场经济题材类.....	139
第一节 当前市场经济题材写作的文化历史分析	139
第二节 大历史、社会转型与内心变迁.....	144
第三节 资本时代的边缘书写与时代寓言	148
第四节 消费时代的寓言写作与“叙述”的后现代	154
第七章 知识分子题材类.....	161
第一节 精神传统与现实语境之间.....	161
第二节 现实日常与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165
第三节 从文学寻根到文化自觉	170
第四节 边缘写作的困境与可能	179

第八章 讽刺题材类.....	186
第一节 启蒙与救亡之外的第三重变奏	186
第二节 “荒唐言”与现实意	189
第三节 寓言写作与发展主义	194
第四节 符号的痛苦与历史之轻重	203
第九章 底层题材类.....	213
第一节 底层写作的类型与模式	213
第二节 现实的表象与名实之惑	218
第三节 底层立场与女性主体的成长	222
第四节 底层苦难的暴力传奇	229
第十章 官场题材类.....	235
第一节 官场生态的现实与表象	235
第二节 官场现实写作与精英立场	240
第三节 官场游戏与情爱修辞学	245
第四节 乡村政治与精神家园	248
结 语 文学应重建作家同现实的“审美关系”及其“当代性”	255
参考文献	258
后 记	265

导 言 “当世叙事”与“现世主义”写作

文学史上常常有所谓的“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之类的说法，作品也煞是写得像模像样，对于前一类，我们常常会用“史诗”来称赞其中的佼佼者，而后者的杰作也会被冠之以“牧歌”或“田园曲”之类的美称。就“史诗”性的创作而言，其作品必须气势恢宏大气磅礴，但于生活的开掘上却不妨浅尝辄止，最为典型的莫过于柳青的《创业史》，或如茅盾的《子夜》。对于这类作品，很是让文学史家踌躇不已。就以文学性而言，这类“史诗”无可挑剔指责，甚至可堪典范，但就趣味及质感论之，却是读者少有问津甚至往往束之高阁如高头讲章。这类作品往往只能“活”在文学史上，而“死”在读者手中。“浪漫主义”则似乎不同。它没有现实主义那种向外向上扩张的野心，而是视角向内向下，把放大镜或显微镜对准人心的幽微，不厌其烦也不胜其烦。这一种探索当然有益于对深幽人心的认识，但在任何时代，“人”还是那个“人”，故而浪漫主义往往就具有了超越时代的意义。相比有些“史诗”躺在图书馆，它虽永远“活跃”在人们的内心——因为任何时代都需要浪漫主义——但却不能活在某一个具体的时代，这不能不说是浪漫主义的悲哀。

表面看来，“史诗”和“牧歌”截然两立，但其内里却是根须相连的。就对生活的简化和本质化而言，“史诗”是另一重意义上的“浪漫主义”。这样也就能明白，文学史上很多作品既可以看作浪漫主义也可以视之为现实主义，这时，我们再去指责“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其实是很没有道理的。这两类作品，于社会人生，都少有余韵可供回味。故此，我们在这里提倡一种姑可称之为“现世主义”的文学写作，即那

种立足现世写作并指向现世的写作。

这一现世主义又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自然主义。自然主义虽表面“忠实”于自然或现实，却其实是为自然而自然，并非真的“为现世”而写作。现世主义首先是一种态度，一种针对现世的全新的态度。它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体验。它不虚妄未来和承诺，不以将来或革命或理想的名义牺牲当下和现世的幸福。相反，它更注重当下和此在，更看重庸碌而琐碎的日常生活。相对于那种脉络清晰简明的现实（主义）呈现，它更愿意关注那种不可化约的繁复的现世。它并不反对线性前进的时间（观），但对复线和多面甚至滞缓的空间更感兴趣；它并非不关注家国之外的大事，而是国家大事只有在家国之内才有意义；这样一种写作，从推崇时间转而崇尚空间，随之而来的是生活多面立体的展现和人生繁复驳杂的表征。

笔者虽反对以往的“本质主义写作”倾向，但并不反对宏大叙事。相反，提倡现世主义是因宏大叙述的倾颓和人类家园的失落而感发。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新写实小说”唱响文坛，宏大叙述也不可避免地从此衰颓下去。虽然说宏大叙述无论如何带有安抚人心和制造幻象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其本身并不能因为携带意识形态色彩而在价值上稍减半分。现世主义代表一种从对现世的理解和关注中获得力量并走向未来的冲动。从这个角度看，现世主义也是一种宏大叙述，一种立足现实但又不限于现世的更高意义上的宏大叙述。

“文化大革命”结束至今已有三十余年，对于这一时段时空，彼时的作家并非没有意识到或想过要加以表现。这三十余年来，是时代风云变幻的三十年，也是百姓生活发生巨变的三十年，对于这一段时空的文字留影，文学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有其不可替代的责任。小说家们往往本着“现实”而非“现世”的态度加以观照，故而很多特别是长篇虽然表现了那一时段的社会生活，但却并非真正意义的“生活原貌”。他们从“现实”的角度加以呈现，故而其折射的生活毋宁说是一种“现实观”下的“现实呈现”。现实主义在很多时候都是一种立足将来而非当下的写作倾向，故而其作品也多从将来的角度描摹构想“现实”，其“现实”与当下并不一定十分吻合。我们所以提倡“现世主义”的创作态度，是想表明小说写作中“反本质主义”的重

要性。虽然说，完全意义上的现世主义在实际上很难达到甚或不能，但作为一种努力，一种意识，其在文学史上、在作家们的创作中却并非虚妄，而是切切实实的存在。

本着这样一种构想，笔者将结合“新时期 36 年以来书写新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实践，分别从改革题材类、市场经济题材类、官场题材类、底层题材类、社会风俗与综合反思类等类别入手，具体探讨这三十多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在反映“现世生活”方面的成败得失，及其在现实和现世之间的矛盾和摇摆。笔者相信，只有通过系统地清理，正本清源，厘清其脉络，辨明其价值，方能对这三十余年来的小说写作有一宏阔的认识，或能对今后的写作是一个很好的参照！这是笔者想要努力的方向。

第一章 改革题材类

第一节 改革小说的现实与“现实性”

按照文学史的理解，所谓改革文学（小说）指的是出现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呼唤或表现农村与城市改革的小说创作潮流。^①可见，呼唤改革是改革文学之“改革”的关键所在；但既然名为改革，就必然有一个谁去改革，以及改革什么的问题，就像当时一部改革小说中的人物所言：“现代写改革的作品都是这样：一个厂长，或者一个书记，到了一个新的单位，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于是，就招来对立面的反对，或是告状，或是造谣。这中间再加上一点爱情的佐料，要么是个独身的女工程师，要么是个寡妇。最后，总是以这个厂长或书记的胜利告终。”^②但这往往只是说对了一半。改革诚然有一个改革者和对立面的矛盾结构，但还需把这一结构放在历史时间的脉络里才能把握清楚。对于不同时期的改革写作，其所呈现出的改革面貌总与彼时彼地的现实处境息息相关，如若撇开现实社会的一极，显然是不能更好有效地理解的。

从文学史的描述来看，改革小说要略晚于伤痕叙述和反思写作，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改革叙述的时间起点问题。也就是说改革是从“四人帮”

① 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8页。

② 张贤亮：《男人的风格》，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95页。

被打倒时（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时（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还是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即所谓恢复到十七年的秩序）开始？在这里，对改革前混乱局面或现状的认识决定了改革叙述的不同类型和改革的展开方式：混乱是由“四人帮”造成，经营管理不善，还是由传统力量的束缚所致？故而与其说改革写作是对现实的反映，倒不如说是对现实观的反映。而事实上，三种不同的回答，其实也就是三种叙述，因而形成了改革叙述的三种主要类型（故事）。这三种类型，也是三组矛盾的展开方式。

第一种类型，可以称之为“乱/治型”。在这一类型的改革叙述中，“文化大革命”之“乱”是造成社会停滞的根本症结，因此，只要“文化大革命”之“乱”得到纠正，社会就会出现快速而迅猛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这一改革叙述常常与伤痕、反思写作有一定的重叠之处。其中最为典型的的就是鲁彦周的长篇《彩虹坪》，“文化大革命”的激进政策和所谓的“革命”实践非但没有使得彩虹坪更富有，反而是更加的贫困，甚至连基本的温饱都不能保证，改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提上日程，其在某种程度上也就等同于拨乱反正。在这一改革叙述类型中，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往往成为关键，是只批判“文化大革命”的非人性与非人道，还是直指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左倾思潮。这样又形成了“乱治型”的两种主要模式。第一种表现为，如果只是批判“文化大革命”的非人道与非人性，改革则从“文化大革命”之“乱”获得合法性，改革就是改“文化大革命”之“乱”了，社会秩序恢复了，现代化和社会生产也就不成为问题；严格意义上讲，纯粹是这一类型的并不是很多，叶辛的《在醒来的土地上》、《拔河》和《基石》（三部均为长篇）和鲁彦周的《彩虹坪》某种意义上属于此类。第二种表现为，如果矛头直指向“左倾”的，则通过追溯“左倾”的错误，说明正是“左倾”阻碍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进程，“左倾”错误至此成为改革合法性的前提和保证。这一类型的小说比较多，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中篇）、张一弓的《张铁匠的罗曼史》（中篇）、王滋润的《鲁班的子孙》（中篇）等，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长篇）某种程度上也属于此类。

第二种类型，是“数字决定型”。在这一类型中，改革的一切指标均以数字和效率为准则，任何与此无关的都要被否定和摒弃。仿佛数字就是一切，就是现代化的关键，而改革的乌托邦承诺也往往在这种数字和效率的神话中得以实现。这一类型的改革叙述最为普遍，蒋子龙的很多小说都属于此类，如《乔厂长上任记》、《弧光》、《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长篇），等等。此外，柯云路的《新星》（长篇）、邓刚的《阵痛》（短篇）、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中篇）、张一弓的《黑娃照相》（短篇）、张锲的《改革者》（长篇）、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长篇）、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长篇）、张洁的《沉重的翅膀》（长篇）某种程度上也属于此类。

第三种类型，可以称之为“传统/现代型”。在这一类型中，改革针对的是传统的力量和惰性。在这里，传统可能作为一种秩序和惰性存在，缓慢而又强大地阻碍改革的进程，因此，要想改革首先就要向这些传统秩序及其代表宣战。即使如此，改革叙述针对传统的态度也并不一致，这种不一致，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传统现代型”的两种模式。第一种是告别传统型。在这一类型中，传统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显然都是需要被否定和革除的：传统往往作为某种主导秩序，严重阻碍了一地一区的发展，不革除则不能前进。其中，如柯云路的《三千万》、《新星》、《昼与夜》、《衰与荣》是典型，另外，像张锲的《改革者》、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鲁彦周的《古塔上的风铃》（长篇）和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某种程度上也属于此类，由此可见，这一类与第二种改革叙述“数字决定型”有某种内在的联系。第二种则是“无望的怀旧型”。在这一类型中，传统虽然终究要被时代历史所遗弃和否定，但作者/叙述者往往表现出态度上的犹豫不决，乃至小说处处笼罩在一种无望的怀旧气息之中：虽然明白时代向前发展的不可抗拒性，但对美好而无用的传统又报以无限的乡愁和留恋；现代虽然代表着历史的潮流，但也可能蕴藏着某种邪恶和污秽。因此，这一类小说相对于前面几种改革叙述，在文化内涵上则要显得丰富深刻得多，也最为难以阐释。代表作有贾平凹的《腊月·正月》（中篇）、《浮躁》（长篇），王滋润的《鲁班的子孙》，周大新的《家族》（短篇），张一弓的《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迹》（中篇）等。这

种对待传统的矛盾态度，某种程度上又与此后不久的寻根小说存在某种内在的关联。

二

虽然说改革小说大致有上述的三种不同类型——事实上，很多小说都难以归类，而且三类之间常有重叠——但在以“文化大革命”作为潜在的“大他者”这一点上，改革写作却是相当一致的；而即使是80年代末写就的《骚动之秋》中，岳鹏程的改革也是以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局限——即越革命，越贫穷——为前提的。在改革写作中，改革的合法性同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这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改革任何年代都有，却独独是发生在80年代前后的表现社会改革的小说被称之为改革小说。在这一框架下，改革的提倡似乎是对“文化大革命”批判的逻辑延伸，其在数字型和传统/现代型改革叙述中也是如此。

“改革小说”作为一股文学思潮只能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才出现，其反映的不外乎是这样一种现实观，即现实的困境虽非必然源自“文化大革命”——或为传统的积弊，或为“文化大革命”之乱，或为效率低下，等等——但因“文化大革命”的出现大大阻碍了社会的（正常）发展，人民的生活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困窘，因此改革势所必然。如此看来，改革小说的出现及其命名还是某种历史观的反映。

在今天的语境中，改革小说虽然可以从现代性的线性时间——从昨天到今天向明天——发展的脉络中加以理解，但因其终不能挣脱历史和记忆的束缚，改革的写作总不能很好地表现现世和当下本身。这似乎是某种循环/魔咒：正因为历史的沉重，改革叙述格外倾向于给人以将来美好的承诺；反过来，改革虽指向美好的未来，但又始终笼罩在历史的阴影和幽灵之中。改革叙述往往在这两极间摇摆，左支右绌，进退失据，这也往往是其让人有挥之不去的沉重感的原因。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曾这样说道：“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下，仅仅把以年代为指向的过程转换过来的‘发展’与‘进步’成了历史知识的指导范畴。这样的时间和历史概念必然剥去了人性的维度，无法获得

真实的历史性。”^①作为潮流裹挟下的改革叙述，正是这样一种写作。改革写作虽然与改革的现实实践之间有着某种同步性，甚至互为“镜像”（如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在改革实践中的影响及其引起的风波），但因其深陷于历史和未来之间，无视也看不到现实本身的丰富和驳杂处。改革写作反映的毋宁说是“现实性”而非现实本身。

三

虽然说，80年代的改革写作总有一个改革受阻的“悲剧式”结局，但这并不能阻止现实中的人们对改革寄寓深切的希望。结果似乎正相反：改革（即改革叙述中的改革）越受阻，人们对改革的期望越高，改革也越在这种“悲剧式”的叙述中建构起其矗立不倒的神话。在这一逻辑下，改革无论是暂遇挫折抑或一帆风顺，都是在其特有的矛盾结构中展现自身：改革实践中所展现的矛盾斗争虽其尖锐复杂，但这并不代表或对应于现实生活本身的丰富复杂。另外，改革的意识形态某种程度上也反过来塑造了人们的“现实观”：现实本身的困窘和物质上的普遍匮乏并没有因为现实中改革实践的挫折与曲折而让人窒息，相反，改革的神话所许诺的美好未来使得现实中的人们普遍处于高扬的理想主义和积极向上的精神之中。这也是80年代的中国社会始终处于一种浪漫主义的氛围中的部分原因。

可见，对于改革小说而言，决定其历史存在的并非其是否乃对现实本身的反映，而在于其乌托邦式的承诺。故而一旦理想主义在八九十年代之交随着市场经济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到来而氤氲消散之后，改革小说也渐趋式微。改革小说应运“文化大革命”的终结而生，却不得不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落下帷幕，这似乎是一个悖论：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好转，改革小说作为一股潮流却不可避免地随水东流。但这也正是改革小说的规定性所在。改革小说无法面对现实，故而一旦理想破灭，现实铺天盖地而来，改革小说的历史使命也即告终。八九十年代之交出现的新写实小说、世纪末的现实主义

①〔意〕吉奥乔·阿甘本：《时间与历史：瞬间与连续性的批判》，《幼年与历史：经验的毁灭》，尹星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0页。

冲击波，以及新世纪的“底层写作”等这些迥异于改革小说式革命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的“类改革写作”的相继出现，正说明了这点。这些小说创作思潮虽然在诉求上各不相同，却在不同层面不约而同地一起指向改革伟大承诺的苍白与无力：新写实和现实主义冲击波从相反的方向表明理想主义的虚妄，而“底层写作”则从阶级（或阶层）分野与矛盾的角度再次重提改革的命题。“改革”自此全然没有了理想主义的乌托邦色彩，而仅仅成为解决实际事务与事宜的手段；一旦“改革”从神话降格为手段和工具，“改革”也真正回归并着陆现实/历史地表，对此，我们似乎并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第二节 《乔厂长上任记》与改革文学

通过阅读《乔厂长上任记》，我们会为小说塑造的果敢、魄力和胆识兼具的乔光朴形象所感动和振奋，虽然我们国家的现代化面临重重困难，但一想到有这样一些人物的存在，一切似乎都不成为问题。

但我们也发现，这里其实存在一个令人疑惑的问题，即现代化虽然矛盾重重、积习难返，但这一切似乎都能在“时间和数字”的烛照下迎刃而解吗？小说是这样开头的：

时间和数字是冷酷无情的，像两条鞭子，悬在我们的背上。

.....

其实，时间和数字是有生命、有感情的，只要你掏出心来追求它，它就属于你。^①

而小说的结尾，叙述者又借小说人物的口说：“我们要的是实现现代化的‘时间和数字’，这才是人民根本的和长远的利益所在。”^②

①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短篇小说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② 同上书，第57页。

显然，小说展现出了方方面面的问题，首先是现代化建设中的技术层面的问题，此外如人事问题、制度问题，另外还有厂里厂外之间的问题，即社会综合协调的问题，甚至个人恩怨等。这些问题都是在乔光朴重新上任为厂长后一一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可以说，小说中的重型电机厂其实就是当时整个中国的象征，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劫难后的中国千疮百孔，问题层出不穷，这些问题一个叠一个，重重压在了中国的头上，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这些问题更是纠结在一起，既令每一个有识之士扼腕和愤怒，也同时为他们提供了舞台，无疑这个重型机电厂就是乔光朴施展自己本领的舞台。

如乔光朴所说：“咱们厂像个得了多种疾病的病人，你下这味药，对这一种病有利，对那一种病就有害”，如果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也是一种多种病候的隐喻的话，那么，显然只用一味药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但小说的叙述却无时无刻不在暗示我们，只有也只能是“时间和数字”这一味药才是解决这一切问题的根本。如果说乔光朴深入工厂而后进行的改革是卓有成效的话，显然这种改革除了技术、效率层面之外则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他到厂外去攻关外交无功而返；他把冀申调到服务大队，结果闹得不可收拾；他对待各种态度果断，但也表现出粗暴、简单的一面，结果各种矛盾接踵而来。对这一切“时间和数字”果真能解决吗？毫无疑问，“时间和数字”在这里成了解决各种问题的灵丹妙药。

我们知道，所谓“时间和数字”，是相对于西方现代文明而言的，在时间的坐标上是相对于西方的现代化的滞后，而在空间的坐标上是效率的低下，因此，与其说是“时间和数字”能解决一切，不如说是现代化的承诺给我们以未来的希望。这是改革文学所呈现出的典型的叙述模式，传统或积习是阻挡社会的障碍，而改革和现代则是利剑，任何问题都能在其中迎刃而解。现代化在这里成为一种超验的神话，我们不仅要在效率上（即数字），即在小说中是向西德的专家学习，而当我们的改革遇到困境时，我们想到的也是“先进国家的做法”。因此，这里既是传统和现代的对立，更是中国和西方的对立，传统中国的落后迫使英雄主人公产生了急起直追的焦虑情绪，自然，任何问题在他们眼里都成了传统/现代之间对立的表现，这种毫不妥协的现代性断裂姿态既使得主人公，也使得叙述者不可能在“传统”之中发